

国民政府同苏联的最后博弈者

——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与
斯大林的谈判（1945～1946）

李玉贞

1945年春季，中国抗战近8年，太平洋地区出现了有利于盟国的形势。中国一方面艰苦卓绝地支撑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战场，另一方面因对联合国的建立做出重大贡献，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然而在胜利将至时国民政府却面临着一些棘手问题，第一，如何处理国共关系。1945年1月26日开始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在重庆提出了胜利后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使国家民主化，要经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第二，2月3日至12日美英苏三大国在苏联雅尔塔举行会议，决定了远东和世界政治格局^①，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拿中国的主权达成了一笔交易。本文旨在分析国民政府的使者宋子文、王世杰和蒋经国同斯大林的博弈遇到什么情况，结果如何？中苏友好条约是否仅仅具有单一性？半个多世纪后这场博弈给人什么启示？

^① 会议文件见〔苏〕萨纳柯耶夫等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

一 雅尔塔会议上的不祥之兆

国民政府从1937年就期盼苏联对日作战^①，但这个愿望直到抗战的最后关头1945年的8月8日才得以实现。这年初原子弹还没有研究成功时，美国决定秋季对日发动总攻，而为此会有约100万兵员的牺牲，否则远东战争还要持续，有关国家势必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使苏联能早日及时参加对日之战，便成了美国政府当务之急。”^②这样才能就地日本消灭在其占领的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而不使其调回日本。为此，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英美苏三大国“替”中国付出了代价而换得了苏联出兵。

当时的苏联对于1904年日俄战争后失掉在远东的利益一直耿耿于怀。收复这块“失地”的思想浓淡不同地显现于中苏交往的过程中。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盟国的英美也心知肚明，英国首相丘吉尔最早在1943年11月的英美苏三国德黑兰会议上提出俄国“理应可以使用不冻港”的建议，斯大林胸有成竹：“这个问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讨论”，并相当矜持地表示“远东没有一个港口是完全不冻的，因为海参崴只是个部分不冻港，而且还被日本控制的海峡所包围”。罗斯福明确提出可以把大连作为一个自由港。斯大林知道中国人不会“喜欢”这个想法。^③他在等待适当时机。中国政府得知后^④，曾经试图改变局面，但力

①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自莫斯科致蒋介石的电报（1937年11月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二）（下同），台北，1981，第334页。

② 《艾奇逊为编纂〈白皮书〉致杜鲁门的信》（1949年7月30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第458页。

③ 方连庆等编《苏联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305页。

④ 《战时外交》（三），第539页。

不从心。

雅尔塔会议讨论苏联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时，斯大林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先说因有《苏日中立条约》，苏联不能同一个与俄国“没有重大纠纷的”日本作战；接着说如果突出苏联的“国家利益”，那就师出有名了，“人民就会理解”，他也“非常容易向最高苏维埃解释”。他指的是，第一，按照沙皇的做法“使用从满洲里到哈尔滨，再从那里到大连及旅顺港的铁路线，以及从哈尔滨向东到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的铁路线，在那里同哈巴罗夫斯克铁路线连接”。第二，苏联需要中国的旅顺和大连这两个不冻港作为出海口。^①英美苏三国签署的《关于日本的协定》（《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的对日作战。为此苏联索要的条件是：维持外蒙古的现状；恢复日俄战争前俄国在远东的权益，即：库页岛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恢复对旅顺海军基地的租用；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同时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这些条件要在日本投降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斯大林的巧妙设计，明知国民政府持反对立场，斯大林决定暂时不告诉蒋介石，而做出了另外的设计：在苏联西线对德战事结束后，必要时“调 25 个师到远东”，对中国造成兵临城下之势，“那就可能同蒋介石谈这些问题”了^②。

二 国民政府准备应对

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从罗斯福总统处得知了会议内容，并向

^① 《苏联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册，第 359 页。

^② 《苏联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册，第 359 页。

蒋介石做了报告^①。在雅尔塔会议参加国正式把情况通报中国之前，蒋介石曾经希望美国从中斡旋，但无结果。1945年5月2日苏联攻克柏林，蒋介石致电斯大林表示祝贺^②。中国也准备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于世人面前。1945年6月3日，蒋介石直接向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说明中国的主张：1924年的中苏条约应当是两国关系的“历史基础”。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及租界是列强加予全中国人民的“耻辱”，“人民之心理与要求”是必须尊重的，所以请苏联帮助我国“东三省主权完整、行政独立”，此后作为帮助我国收复失地的友邦，苏联可以为远东和平在中国领土内建设海空军基地和使用东三省的铁路；请苏联先于其他国家坚定表态帮助中国独立行政与领土完整，这样一则可以击溃国际上的反苏运动，二则，此后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理，必皆同情于苏联”，届时全中国的人力和物资都可以为“苏联与中国的合作互助关系所利用”。6月12日，蒋介石又向彼得洛夫重申前意并为苏联的“国际信誉”考虑说不设置“租借地”的做法“对苏联是有利的”，并答应中苏“共同使用军港”，那是“友好合作”。^③

三天后即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奉总统杜鲁门之命履行雅尔塔协议把会议内容告诉中国。6月26日蒋介石第三次召见彼得洛夫，比较严厉地向他宣布中国政府的立场：“中苏两国有关的事情，应由中苏双方直接商议，美国同意与否，没有关系。”同时，他告诉彼得洛夫，宋子文将奉派^④赴苏与斯大林谈

① 《战时外交》（二），第542～543页。

② 电报存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6，第100～101页。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Рус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1937 - 1945, 《20世纪俄中关系1937 - 1945》第4卷，том.1 - 2（以下简称СКО）；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0, Москва, ч.2, стр.35 - 36。

③ 《战时外交》（二），第549～552、559页。

④ 宋当时正在旧金山参加联合国会议。《战时外交》（二），第547页。

判。^① 宋子文奉有的指示是：“‘租借’地名称……非设法除去不可”，中国仅仅在铁路、军港等“无损于我国行政与主权”的问题上可以做出让步^②。宋本着这个原则在旧金山会议期间同杜鲁门有过三次会谈。不难理解，作为雅尔塔会议的参加者美国不可能替苏联向中国做出任何保证。^③

三 中国代表团受到高规格的接待

宋子文携带着蒋介石于1945年6月26日写给斯大林的信，偕同蒋经国、外交部次长胡世泽、张福运、卜道明、刘泽荣，与苏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一起动身赴苏，30日到达莫斯科。

蒋介石早在1944年就有派遣蒋经国赴苏的想法^④，此时他感觉该下“猛药”了。况且蒋经国在苏联眼里是“昔日的左派”^⑤。为此，苏联“盘点”了他在这个国家度过的12年^⑥。蒋经国的身份使代表团的规格大大提升。苏联党政军高官，各国外交代表都出现在莫斯科机场，其仪式的隆重达到了欢迎丘吉尔的水平^⑦。宋子文热情答谢，称赞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元帅领导下“表现的绝顶的英雄气概”^⑧。到达莫斯科当日下午宋子文等就同

① 《战时外交》（二），第558页。

② 《战时外交》（二），第558页。

③ 会谈情况见《战时外交》（二），第556~557、563~564页。

④ 系由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H. 费德林1944年10月31日同宋庆龄谈话时披露，CKO, ч. 2, стр. 817~819。

⑤ 系由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H. 费德林1944年10月31日同宋庆龄谈话时披露，CKO, ч. 2, стр. 3、25页。

⑥ 俄罗斯新公布的这件档案确切介绍他在苏联期间活动的史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蒋经国于1936年2月9日在《列宁格勒真理报》发表《致母亲的信》，“激烈批评父亲”一事尚待考证。CKO, ч. 2, стр. 341~342。

⑦ 《战时外交》（二），第572页。

⑧ 1945年7月2日《中央日报》（重庆版），第1版。

苏方斯大林^①进行了15分钟的礼节性会谈。受到蒋介石“完全信任”的宋子文转交了蒋的亲笔信，内称“宋院长……所陈述之意见，均能代表”他蒋本人，故请斯大林“阁下开诚赐谈，奠定中苏两国长久友谊合作之密切巩固基础”^②。

四 中国代表团出师不利

——关于外蒙古问题的谈判

7月2日下午8时至10时30分，中苏进行第一次会谈^③。雅尔塔协定中提到的和未提到的（如中共等）问题都或多或少地被涉及。

会谈伊始的和谐气氛在接触到实际问题时立即改变，斯大林拿出《雅尔塔协定》，严厉地对宋子文说“只能拿这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中国代表团被逼坠入窘境，“只好忍耐”。^④而原拟据1924年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进行谈判的立场也被否定了。

首先谈的是外蒙古问题。雅尔塔协定第一条所说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原为一个模糊概念：“现状”是指一个独立的“外蒙古人民共和国”还是如上述1924年中俄条约所指苏联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宋子文表示可把外蒙问题搁置起来，斯大林“不能同意”，说“外蒙人民不愿受中国政府统治，希望独立”^⑤。更加重要的是斯大林表态“现为苏联国防关系，不得不在外蒙驻兵”，对于中国的领土完整，斯大林的话

① 还有莫洛托夫、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外交部副部长洛佐夫斯基。

② 《战时外交》（二），第571页。

③ 苏方出席人员为：斯大林、莫洛托夫、彼得洛夫、洛佐夫斯基，译员巴甫洛夫。中方出席人员为：宋子文、傅秉常、胡世泽、蒋经国。

④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有限公司，1974，第66页。

⑤ 《战时外交》（二），第576~577页。

“为中国计，割去外蒙，实较有利”有些费解。最后他索性摊牌：“苏联在外蒙领土应有自卫之法律权”，否则“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① 蒋经国据理力争，说把外蒙古割离中国，中国不仅失却七八年“抗战的本意”，而且国民党会因“出卖了国土”而愧对中国人民。但斯大林强硬反驳：“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可以自己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②

至7月12日，中苏共进行6次会谈，中国始终坚持先不讨论外蒙古问题。但被逼至无奈之际，宋子文只能“卧榻之旁，任人鼾睡可也”^③。斯大林却以苏联历史上发生“放弃芬兰与波兰”^④为例说服中国代表：苏在旅顺问题上让步，交换条件是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亦应让步”。宋子文拒绝，担心西藏问题将因此发生连锁反应。

斯大林把外蒙古问题与旅顺事连在一起，他基本同意对其不用租借方式，而由中苏共管，期限40~45年，交换条件是：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大连事，斯大林主张中苏共管，宋子文不同意，认为应由中国主管。中国认为中东铁路可双方共管，但以20年为限。^⑤

讨论大连港问题时，斯大林把1898年沙皇俄国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作为依据，进而提出该港口国际化的要求。宋子文

① 《战时外交》（二），第579页。

②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67页。

③ 《战时外交》（二），第579页。

④ 1808~1809年俄瑞战争后芬兰成为沙俄殖民地。1917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决定接受其独立要求。波兰先后于1772、1773、1775年三次被普鲁士、奥地利和沙俄瓜分。俄国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迫于形势和各方压力，宣布波兰拥有自决权。

⑤ 《战时外交》（二），第576~577页。

当即不客气地反驳：“旧条约即无战事亦当满期，且为帝俄所为之宣言，余思阁下不至以该条约为依据。”^① 况且“即在帝俄时代，大连亦为自由港。”至于大连港所收关税，宋子文认为理所当然应当归中国，而不能如斯大林主张中苏各半，宋说：“如是阁下将致大连于死地，因东三省尚有其他港口，吾人仅能得收入之半。”^②

外蒙古问题事实上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双方僵持，宋子文甚至有中止谈判的意图^③。

此时蒋经国以个人身份前去见斯大林，向其反复申明，把外蒙古割离中国既损伤中国主权又违背民愿。但斯大林再次强硬地表示，他是“完全是站在军事战略的观点而要这块地方”，“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④

国民政府定出“交换条件”。蒋介石充分体会到“俄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方式所能履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忍痛牺牲，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⑤

① 中文记录《战时外交》（二），第580-581页。此次谈话的俄文记录中（CKO，上册，第75页）没有“余思阁下不至以该条约为依据”一段。

② 《战时外交》（二），第581页。

③ 《战时外交》（二），第593、598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700-701页。

⑤ 这是7月5日蒋日记中的话，《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746页。

处于僵局中的宋子文开始接到蒋介石一系列指示，基本思想是“外蒙独立事可让步”^①，将其搁置到“我国内真能统一时”予以考虑^②。中国允许外蒙古独立的条件是：保证中国东北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以及苏联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的反政府力量^③，并请斯大林做出答复^④。不言而喻，阻止中共发展，阻断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是国民党决定向苏联让步的重要因素。7月9日的会谈中宋子文向斯大林宣读了蒋介石的电报并又一次申明“倘我国政府此时承认外蒙之独立，将违反中国人民之本性，此一问题实超越政府之安全与巩固，此实违反真正之舆论……实欲史太林统帅了解蒋委员长在中苏两国之永久友好祭坛上，所作牺牲之巨大”^⑤。

至此，未来条约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形成：1. 满洲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大连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20年。旅、大行政管理权属于中国。中东、南满铁路所有权属中国，铁路干线可与苏联共同经营，利益平均分配，期限亦为20年。2. 新疆问题，苏联依照以前约定，协同消灭叛乱，恢复交通贸易。阿尔泰山脉仍为新疆之一部。3. 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4. 外蒙，中国政府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采取公民投票方式，投票以后中国政府当宣布外蒙之独立。外蒙之区域应以原疆界、中国旧地图为准。虽然斯大林让宋子文“将此电译文抄示为佳”^⑥，事

① 这是7月6日午后蒋介石同孙科、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陈诚等人商谈的结果。《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118页。

② 《战时外交》（二），第593～594页。

③ 《战时外交》（二），第596页。

④ 《战时外交》（二），第597页。

⑤ 苏联公布了这封电报的英文和俄译文，经核对与中文略有区别，CKO, q. 2, стр. 100～104。

⑥ 《战时外交》（二），第612页。

实上默认了上信，但争论依然存在。^① 无论如何外蒙独立已经是“既成事实”了。斯大林提议在击败日本之后公布外蒙独立协定，而其他协定在8月底公布。当国民政府代表问到关于外蒙应拟订何种协定时，斯大林胸有成竹地回答：“可说明外蒙经过公民投票手续后，中国不反对其独立。”他甚至稳操胜券地表白“余对公民投票并无所惧”。^②

五 难以逾越的门槛——中国东北主权问题

维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确定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的地位，是中苏谈判的第二个棘手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苏联对日宣战后，中国政府军随同苏军进入东北和苏军撤出满洲的时间。仅仅这后一个“日期”问题，也是宋子文追问了多次才在7月11日获得斯大林的回答：“倘无意外事件发生，无须三个月时间。”^③ 中国代表团的窘境可想而知。

国民党十分担心东北落到中共手中，7月2日和10日的会谈中都提及中国派政府代表随同苏军进入东北一事，宋子文说：“此等代表将协助苏军总司令建立合作关系。”

关于铁路问题，焦点是和平时期能否经铁路运送苏联军队。斯大林曾提出“每次运兵不超过一师至二师”，或“每次由双方协议决定”运兵数量的要求，中国代表断然拒绝^④。

① 宋子文没有示弱，他把承认外蒙独立与日本逼迫中国承认满洲脱离中国相提并论，斯大林不同意，认为“满洲有中国人民，而外蒙则无之”。宋子文反驳说：“在外蒙亦有中国人民，惟独占少数而已。”宋强调“转让领土为一极苦痛之事。”但此时争论的结果已没有意义。后来他们讨论的是外蒙古与中国的疆界等问题。见《战时外交》（二），第615页。

② 《战时外交》（二），第620页。

③ 《史太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五次谈话记录》，《战时外交》（二），第624～625页。

④ 《战时外交》（二），第626～627页。

路警问题。中方坚持由中国保护铁路，路警为华人。斯大林稍作让步。^① 但是苏方无论如何不同意宋关于理事会内中苏人员各半的建议^②，此事只好搁置。

关于旅大。宋子文申明，大连不在军事区域内。大连为满洲主要港口，应由中国管理，可聘用苏联专家。斯大林未表态，反问“旅顺如何？”宋子文回答：“蒋委员长希望旅顺亦由中国方面管理，但余认为史大林统帅所提旅顺应有统一之军事指挥官，实属合理……但此区域范围不应包括大连，应在大连以南。旅顺应有一中国军事指挥，其人选由中国征得贵国同意后任用。”

此时斯大林、莫洛托夫搬出《雅尔塔协定》，说“方案提及苏联在大连之优越利益。”宋子文反驳道：“优越利益非指苏方将管理大连而言，余之了解为旅顺军港苏方应有指挥官，但在非军用港与非军事机关无必要。”然而斯大林自有他的理论：“余等需要大连、旅顺为期三十年，倘日本恢复其力量，吾人可于此地打击之，日本一如德国，必将再起，如将区域缩小，吾人将无所能为，旅顺将无后地，吾人准备对区域范围稍加减缩，但不能如阁下建议之甚。”说毕还用红笔在地图上划出其要求“旅顺军港必须有一后地，并须辅之一民用港口”。^③ 争论再三，宋子文仍不肯答应。由于斯大林等须赴柏林，“谈判暂告中止”，7月12日晚上第一阶段谈判暂停。不过双方依然称“谈判情形，极为友好。”^④ 宋子文于14日回国。

六 中苏谈判桌外的谈判

宋子文、蒋经国回国后，为对付后一轮谈判做着紧张的准

① 《战时外交》（二），第628页。

② 《战时外交》（二），第628~629页。

③ 《战时外交》（二），第630页。

④ 1945年7月15日《中央日报》，第1版。

备，国民政府既要设法巩固自己独揽中国政权的地位，又要应对雅尔塔会议参加国苏、美、英在中国的利益，自7月12日至8月7日中苏谈判休会期间同有关国家进行着频繁交涉。

首先看美国政府。7月13日美国就明确了对几个有关问题的基本立场：外蒙古“维持现状”指的是外蒙古乃中国领土。但它又认为宋等对苏联的让步表明“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现状是明智的”，因这“不会影响任何真正的利益。”^①同时美国国务院根据哈里曼的建议起草了一个文件，详细阐述苏方在谈判中提出的条件哪些是中国可接受的^②。

美国认为既然“由苏联实际控制东北地区的主要铁路，享有大连的主要行政权和独占旅顺港的行政权”，那么再“承诺尊重中国主权”就毫无意义。这将意味着苏联“倒退到帝国主义”，美国甚至打算或单独或与英国联手对苏联政府施加影响。但美国把遏制中共置入了对华政策中，认为苏联既然承诺不支持中共，那中国必将“大受其益”。为此国民政府就“必须准备做出合理的让步”，而且这“无损于美国的利益或违反美国的政策”，于是向苏联“施加影响”就成泡影。

所谓“无损于”指的是“美国在东北地区的贸易和交流”中得到的利益。美国决定从中苏“两个政府那里获得明确的承诺”，使美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受歧视的原则受到尊重……美国具有使用大连港口设备的同等权利，有权租赁和购买那里的土地供商业和居住使用（在日据时期经常被拒绝使用的权利），以及有权自由充分地使用铁路的交通设施。”^③

① Memorandum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Grew)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13, 1945, *FRUS, 1945*, Volume VII, pp. 936, 938.

② Memorandum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Grew)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13, 1945, *FRUS, 1945*, Volume VII, pp. 938 - 941.

③ Memorandum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Grew)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13, 1945, *FRUS, 1945*, Volume VII, pp. 938 - 941.

7月16日，陆军部长史汀生从波茨坦给杜鲁门发了一份备忘录，表明美国严格按照传统的对华政策即“门户开放和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来解释这个协定，奉行的准则依然是“利益均沾”。史汀生一方面竟代替中国承诺“向苏联提供它进入满洲的港口”，另一方面又要制约苏联：“不能让俄国人控制大连”，在这个前提下，史汀生称美国“将毫不犹豫地支持”宋子文同苏联的谈判。对于旅顺，史汀生认为“将旅顺港出租为海军基地，这一提议的意向本来就是一个错误”，宋子文下一步同苏联谈判时，对大连或满洲的“军事利益和支配权，都不应该作进一步的转让”。^①

乍看起来文件中有“闪光点”，对中国有利，然而美国不想进一步制约苏联，它认为中国再向苏联做出让步也“并不影响美国的利益”^②。宋子文关于允许苏联政府将部分港口地区作为商业专用的建议“好像已经充分保证了这种利益”^③。

不过美国还是不放心。蒋介石本希望杜鲁门在7月与斯大林的柏林会晤中“立即采取行动来支持”中国^④。7月23日杜鲁门却回电“我请您执行雅尔塔协定，但未请您做出超过那个协定的让步”^⑤。美驻苏大使哈里曼在7月28日向国务卿贝尔纳斯坦言，尽管宋子文同斯大林谈判中已经尽最大努力维护中国权益，但是中国“难以靠自力抵挡目前苏联的过大要求”。他预见“宋将被迫做出让步”。他担心这让步会“损害”美国“国家利

① Memorandum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Grew)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13, 1945, *FRUS, 1945*, Volume VII, pp. 938-941.

② Memorandum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Grew)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13, 1945, *FRUS, 1945*, Volume VII, p. 944.

③ Memorandum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Grew)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13, 1945, *FRUS, 1945*, Volume VII, pp. 944-948.

④ Memorandum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Grew)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13, 1945, *FRUS, 1945*, Volume VII, pp. 948-949.

⑤ 《战时外交》(二)，第640-642页。

益”，那时美国将无法推卸“门户开放政策在那一地区失败的责任”。^①

第二是外交人员的频繁接触。7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重庆会见了从莫斯科归来的宋子文，次日他致电贝尔纳斯，报告“[蒋]委员长迫切希望尽早与苏联达成公正友好的协议……宋在莫斯科已经同意中国与苏联都承认外蒙人民共和国独立”^②。

7月31日哈里曼也致电贝尔纳斯，要求授权他向斯大林提出一个建议：“创立一个有中、苏、美，也可能有英国政府代表参加的国际委员会，以监督大连作为自由港的管理。”^③8月5日哈里曼得到授权向斯大林转告：美相信宋已经满足了雅尔塔协定的要求，希望大元帅“不要再迫使中国作更多的让步”，那会“影响我们美国的利益”，这在客观上似乎又有利于中国，他甚至要求在中苏达成协定的同时，应立即达成并公布斯大林重申尊重满洲“门户开放”政策的书面保证。哈里曼还向斯大林表示，美国“不反对成立一个由中、苏、美（可能还有英国）政府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以监督大连作为一个自由港的经营。”^④

另一方面，彼得洛夫和赫尔利也及时交换情报，以保证各自的利益并牵制对方的过分要求。他们分析了中国代表团情况，并为中苏顺利签约“做出设计”，甚至有意干涉中国谈判代表团的

① *FRUS, 1945, Volume VII, pp. 950 - 951.*

② *FRUS, 1945, Volume VII, p. 953.*

③ 电文称：“1）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拒不同意原由斯大林提出的要求租借大连港的提议，并坚持使该港国际化成为自由贸易港；2）我们不同意把该港置于苏联军事区内或用作苏联海军基地”。之所以要成立联合委员会，是因为斯大林可能不同意宋关于该港是在中国管辖下的自由港，其一部分按商业惯例租赁给苏联作为过境运输之用。*FRUS, 1945, Volume VII, pp. 953 - 954.*

④ *FRUS, 1945, Volume VII, pp. 955 - 956.*

组成^①。为使中苏顺利签约，两位代表还商定“要把地图和条约文本都准备好”，以表明“这是一个好的，对中国有利的条约……看起来不具有侮辱性，务必特别强调中国的主权神圣，务必不要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可谓“用心良苦”！

第三，美国向苏联申明自己的观点。1945年8月8日哈里曼把美国立场告诉斯大林：

1. 《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越权益”，美国总统也应当告诉本国人，这不会影响美国利益，因此他建议把这一点应写入记录并公之于世。斯大林同意。

如果说早在1922年孙中山就认为苏俄以“苏7：中3”的比例组成一个委员会处理中东铁路的建议太不公正^②从而予以拒绝，如果说就连同情中国人民正义要求的越飞都据政府指示认为苏俄给予中国的已经“够多了”，中东铁路“不能再给了”^③。那么此时斯大林几乎用同样的语气说，苏联“对中国人相当慷慨了，铁路和港口都是由俄国出资建造的”，可现在俄国已“同意与中国人共同使用并共同拥有了”。哈里曼一针见血地指出，承认中国在自己领土上的全部主权、允许中国主宰自己的命运及其经济自立是美国的一贯政策，不论是罗斯福总统还是杜鲁门总统都不希望这一政策倒退。斯大林口头表示赞同。

① 赫利利自诩“十分了解”中国代表团，他告诉彼得洛夫说宋子文是强硬派，是“反动分子”，不赞成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让步，总躲藏在蒋介石背后给他出主意对抗苏联的某些建议。真正希望中苏谈判成功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若是宋依然故我，不妨由蒋介石或蒋经国代替他。他直言不讳地说，宋除了害怕为签署有辱中国的条约承担罪责外，还有个人原因：身为行政院长，宋子文总以为自己是仅仅次于蒋介石的角色，可是斯大林在谈判中明显地偏爱蒋经国并为蒋氏父子干杯，特别是把蒋经国称为蒋介石的接班人，宋由是十分不快，这也是他不愿意再去莫斯科的重要原因。CKO, ч. 2, стр. 147。

②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第151、172页。

③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64页。

2. 大连问题。罗斯福总统的意见是，让大连成为一个自由港，划在军事区以外。斯大林答应遵守门户开放政策，而且这一原则适用于铁路。^①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代表同苏联的谈判实际上孤军作战，美国有时表现公正，但它的基本立场是中苏都应严格“实行雅尔塔协定——不多也不少”^②。中国权益受到损害时，美国并没有“拔刀相助”。

第四，是蒋介石再做努力。7~8月间蒋介石在重庆两次会见彼得洛夫。

1945年7月19日，蒋介石同彼得洛夫就外蒙古“保持现状”争论许久。蒋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牺牲很大”，但政府“可克服一切反对意见，解决外蒙问题”，交换条件是“必须苏联协助我东三省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及解决国内共产党问题”，以及新疆问题。鉴于斯大林等即将参加柏林会议，鉴于中国已经吃了《雅尔塔协定》的大亏，蒋介石郑重声明：“这次柏林会议，如果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而有所决定，因为中国并未参加会议，中国决不承认。”^③ 这是一个独立国家应有的姿态。

此次会见后，蒋介石又通过赫尔利大使电致美国，把7月19日致斯大林的信作为附件放在电文中。

蒋经国面临着前往莫斯科参加第二轮中苏谈判，所以也在8月4日随父亲会见彼得洛夫。蒋介石强调中国的立场：1. 务必顾及中国主权、行政之独立与完整。2. 中国决不能接受苏联在旅顺港以南一百公里半径内之岛屿设防非得苏方同意不可的建议，中国决不能牺牲对这几个岛屿的主权。蒋再次表示中苏两国应当建立的是“像民国13年时代那一种的”关系。待苏联对日

① *FRUS*, Volume VII, pp. 960~965.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第458页。

③ 《战时外交》（二），第636~639页。

作战，中苏条约签订后他本人将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关于中国代表团的人员组成，蒋介石特别介绍了熊式辉：还在北伐时期，熊就是蒋介石的参谋长，二人长期共事，现在熊是中央设计局主任，他将代表国民政府担任东北行营主任。^① 蒋介石的谈话基本上确定了王世杰、蒋经国和宋子文下一轮谈判的基调和中苏条约的内容。

七 中苏第二阶段谈判，中国被迫 签署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中国谈判代表半途换马，宋子文、蒋经国再赴莫斯科。“丧权辱国”，对于任何个体和群体都是永远的耻辱。宋子文从莫斯科沮丧地回国后，深恐按照苏联要求签订的条约“将在政治上摧毁”其签署者^②。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因此经历了一次中途换马的插曲。

宋子文把同斯大林谈判的记录交给王世杰并建议他担任外交部长，后者不胜惊奇，阅材料“至深夜始竣”。另一方面宋向蒋介石请辞。蒋7月25日对王说，宋对“中苏谈判涉及承认外蒙战后独立之事……颇畏负责”^③，但他又说服王“外蒙早非我有，故此事不值顾虑。”王知“拒绝，便为畏负责之表示。”值此“中苏情势紧张、关系极大之时，本身之毁誉不宜再予考虑中也”^④。他只好同意担任外交部长，但他向蒋介石声明“订中苏

① 《战时外交》（二），第640-642页；CKO, ч. 2, стр. 151-152 所载此次谈话记录内容不尽相同，其中有两项内容是中文文献缺少的，一是蒋介石明确告诉苏方，宋子文将到美国谈判战后美国援助中国的问题，二是介绍熊式辉。

② 他回国后甚至向赫尔利表述过这种心情。FRUS, 1945, Vol. VII, pp. 952-953。

③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第130页。

④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第131页。

协定时，不可有任何秘密协定；外蒙问题，宜于批准前向立法院及（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报告，否则于国家及负折冲之责者均不利。”^① 王世杰可谓临危受命。1945年8月5日上午，宋子文率领新任外长王世杰，以及蒋经国、熊式辉等一行17人，偕同彼得洛夫和苏联使馆一等秘书列多夫斯基（А. М. Ледовский）等四人同赴莫斯科。

中苏第二阶段谈判。8月7日晚10时中苏开第一次会谈。苏方出席人员为斯大林等5人，中方为王世杰、蒋经国等^②。主要议题为：旅顺、大连、中东和南满铁路、外蒙边界。

关于旅顺问题。在8月7日的谈判中苏联已经基本同意在旅顺区域划界。

宋子文提出大连与南满铁路必须在军事区之外，大连“由中国管理，但聘用苏联技术专家若干，仓库栈房可长期租与苏方使用……期限可为30年”。斯大林只同意30年租用期限的建议，但否定了最基本的内容。^③ 这天的讨论不欢而散。

宋子文强调，中国行使主权任命旅顺、大连民政人员，勿须经苏联同意^④。他并转达蒋介石关于成立一个中苏军事委员会商讨共同使用旅顺港事宜的建议，并允诺选用“对苏联友好的人员”。斯大林基本同意“考虑”。^⑤

① 经国民党中央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64次会议正式决定。《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第136页。

② 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彼得洛夫，以及译员巴甫洛夫。中方还有宋子文、傅秉常、胡世泽计5人。《战时外交》（二），第643页。

③ 斯大林甚至反问宋是否“切盼避免谈判中有决裂之印象”。《战时外交》（二），第632~633页。经对照，此次谈话的时间，中俄双方公布的日期不同，俄方记录日期为“8月7日”已经是第二轮谈判期间的事，而且内容比较详细[见《中苏莫斯科会谈期间行政院长宋子文与斯大林的第六次谈话记录（1945年8月7日）》，CKO, ч. 2, стр. 156~161]。但是两件的内容有许多相同之处。

④ 《战时外交》（二），第633页。

⑤ CKO, ч. 2, стр. 157.

关于大连问题，宋子文明确表态：中国“坚持大连应为完全由中国管理的自由港。”双方严重分歧，此问题成为悬案。^①

关于铁路问题，苏方表示尊重中国主权，接受由中方派员担任两条铁路董事长及铁路局长。关于外蒙疆界，宋子文传达蒋介石意图：请苏联派遣军方代表同一起来苏的熊式辉将军讨论，他展示了此次携带的丁文江制作的标明“外蒙原疆界”的中国地图，并建议参照苏联红军1926~1927年间印制的地图，俾就此达成协议。斯大林允予考虑。^②宋子文据蒋介石的命令提出了东北战利品的问题^③，这次会谈未加讨论^④。斯大林同意以

① 莫洛托夫说，当年该港系由俄国出资建造。宋子文说，大连的租借早已经到期。斯大林说，苏联未能使用该港口。宋子文反唇相讥：“那不是中国的过错”。至于大连港的建设，中国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斯大林又借口苏联需要30年的时间来建设这些港口和铁路，这也是为了“中苏两国的国家安全”，与沙皇俄国政策有“天壤之别”。“当年旅顺、大连完全在沙皇俄国手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租借可言。”30年后“我们既不需要中国的港口，也不需要中国的铁路”，那时候，它们都是中国的。言下之意是：苏联这样做，在这30年里也还是“尊重中国主权”。斯大林说“就是为了这个主权，就像为自己的主权一样，苏联才对日作战。沙皇从来不会这样做的。”“苏联是把中国当成平等国家。”沙皇则没有平等对待中国。苏方坚持大连董事会由华人担任，苏联人任港口管理局局长。宋子文没有让步。CKO, ч. 2, стр. 158 ~ 160。

② CKO, ч. 2, стр. 161。又见《战时外交》(二)，第643页。

③ 《战时外交》(二)，第643页。

④ 据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8 August, 1945, FRUS, 1945, Volume VII, pp. 958 ~ 959 记载，该次会谈后宋子文把谈话情况告诉了哈里曼，后者电告美国务卿，其中关于战利品的说法与中方的会谈记录有些出入：“斯大林然后提出了‘战利品’问题。他指出，包括部分日本企业股份在内的某些日本资产，应被视作红军占领区内苏方的战利品。宋追问斯大林有何具体考虑，斯大林避而不答，将此事留在以后讨论。”哈里曼认为“这是斯大林抬高价码的又一例证”，因此建议：我们应该拒绝他对日本企业股份的要求，明确把战利品限定在物资方面，与美国在波茨坦提出的限定保持一致。

后再议^①。

一个非同凡响的插曲出现于是日谈判后。8月8日晚，莫洛托夫在苏联外交部官邸向王世杰及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宣布，苏联遵守其在雅尔塔会议时的承诺，决定自8月9日起与日本进入战时状态，并读了对日宣战书。原来美国于8月5日在日本扔下了原子弹，世界形势剧变。日本已经准备投降。苏联要以东西方战场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于世人面前。中国各界热烈欢迎苏联决定，传媒大造声势，预祝对日作战的胜利。

中国谈判代表感觉到“形势趋紧，不容过事迁延”，乃电请蒋介石，允许他们在谈判中对于苏联坚持参加大连管理一事上做灵活处理^②。此后中苏双方均有所后退，8月10日的谈判在下列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1. 中国必须拥有大连管理的全权，坚请斯大林放弃己见，中国不能任由苏联人担当大连行政长官，而使该处成为“半个外国城市”。再说战后中国还要行使主权从英国手中收回九龙和香港。^③最后双方同意由苏方派遣一人管理港口船务，发生战争时，该市始受旅顺军港之约束；2. 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最迟于三个月内撤兵东北；3. 苏联不干涉新疆内政和尊重中国在新疆的主权。中国代表团表态，“对尚未解决事项，决不作重要让步”。^④

这天遗留问题是：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局长究竟由中国人还是苏联人担任；第二，苏联不同意按中国提供的地图确定蒙古疆

① CKO, ч. 2, стр. 161.

② 《战时外交》（二），第643~644页。

③ CKO, ч. 2, стр. 165~166。《战时外交》（二），第645页所载《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自莫斯科呈蒋主席报告在苏闻悉日本求降及与史达林晤谈关于解决大连市、外蒙疆界及旅顺口外岛屿等问题之谈话结果电（1945年8月10日）》为同一次会见，但苏方记录较详细，其中关于国共关系、中国是否会发生内战，何以不能接受中方关于外蒙疆界划分的建议等内容，可补充中方记录中的不足。

④ 《战时外交》（二），第645页。

界。至此，外蒙边界问题再次搁置。^①

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巧合，在这个始终有争议的关键性的外蒙古问题上发生了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中国从来没有予以承认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于是日即8月10日以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和“小呼拉尔”的姿态发表声明，并恪守1936年苏蒙条约，站在联合国一方对日宣布“圣战”。8月11日《真理报》揭载了这个令世人瞩目的消息。国民政府陷于窘境：外蒙古已经在国际上摆出了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姿态。

国民党遇到了斯大林的杀手锏——中共问题。为同国民党“尽早”签约，斯大林从战后中国实行国家民主化的角度，语气严厉地面对中方代表：“如果国军打击中共，那国民政府就很难得到我国支持。”虽然苏联“不会插手”国共问题，然而一旦国共军队冲突起来，苏联就很难“从道义上支持国民政府了”。王世杰不想使属于中国内政的国共问题成为“国际条约协定的内容”^②，很聪明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蒋介石曾想“背水一战”。8月11至13日中苏代表又逐条讨论了条约草案，双方各有进退^③。但是直到8月13日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重要分歧，在最后关头蒋介石依然致电宋子文等命其在外蒙疆界问题上“有一基准之图籍，以为将来勘界之依据”^④。另一封电报他又嘱宋子文等在承认外蒙“独立以前，勘定界线，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则承认其独立，不

① 熊式辉主张在重庆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斯大林请熊同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А. И. Антонов）接洽。莫洛托夫甚至扬言“蒙古人应该参加”划界。斯大林说：“蒙古人会坚决反对边界的变更”，所以对此问题“还是不提为好”。*CKO*, ч. 2, стр. 168-169。

② *CKO*, ч. 2, стр. 167。

③ 《战时外交》（二），第646-651页；*CKO*, ч. 2, 第172-187页；*FRUS*, 1945, Vol. VII, 第969-970页。

④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790页。

惟无益，而且有害，虽停止交涉，亦所不恤，务希抱定此决心与态度为要。”^① 但这时苏军“已大规模攻入东三省，倘再拖延交涉或生根本变化”。宋、蒋、傅只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决定“不顾蒋先生电示，速与史达林解决”。^②

然而日本此时已决定投降，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得来了胜利。战后的中国要在世界的重建中发挥作用，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再在莫斯科同苏联折冲了。蒋介石接电报后立即授权“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可也。”^③ 就这样，中国被迫接受苏联划分的外蒙古疆界。其他如铁路、旅大等问题8月13日基本谈妥。

8月14日，中苏最后一次会谈，决定依中国意见把中东铁路叫做“中国长春铁路”，关于苏军给养和使用的货币问题，宋子文认为“归根结底由日本承担”，双方商定以后到重庆谈判^④。然而这一建议后来事实上使中国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我代表团人员昨晚及前晚均未睡，因为约文之整理甚为费力”^⑤。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于8月14日夜15日凌晨6时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签字仪式。但此前数小时，苏联的电台就播出了条约已签字的消息。王世杰看出苏联如此奇怪的举动乃是因为“日本接受投降之答复是于今晨二时到达此间也”^⑥。中苏两方有关人员出席签约仪式^⑦。王世杰和莫洛托夫代表中苏两国签字。条

①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790页。

② 《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149页。只有王世杰有所保留。他主张暂缓与斯大林的谈判，同时电请蒋介石“授权于余及宋子文权宜处理”。《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150页。

③ 《战时外交》（二），第649页。

④ *CKO*, ч. 2, стр. 182-184.

⑤ 《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153页。

⑥ 《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152页。

⑦ 苏方为斯大林、莫洛托夫、副外长洛佐夫斯基、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及外交工作人员，中方宋子文、王世杰、胡世泽、傅秉常、熊式辉、蒋经国。

约由其本身和一系列协定与附件组成^①。

签字仪式后，斯大林、宋子文等又做会谈。斯大林说：“帝俄时代，俄国政策在分裂中国，与日本同一目的。苏联政府则在与中国为友，且希望中国军力强胜，使日本不能再起。”^② 斯大林举杯“祝蒋委员长健康！”尔后宾主共进早餐^③。蒋介石致电斯大林，称苏联出兵东北加速了日本投降，坚信中苏友谊不断发展，成为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因素^④。8月24日国民党中央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过了3年多斯大林承认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⑤。

八 中国与苏联，签约后的得与失

苏联从条约得到了什么？俄罗斯权威学者们2000年的观点是，这个条约“的确具有重大意义。苏联拿回了俄罗斯据1896年条约、同中国签订的其他条约所享有的，但由于俄国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失败和日本后来的其他侵略行动而失掉的权利和优越权益。苏联收回了利用旅顺、大连海军军事基地的权利。这两个不冻港为苏联的军舰和商船驶入太平洋和世界广阔水域开辟了一条无障碍通道。苏联得到了和中国共同利用当年由俄罗斯出钱建造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权利。这两条铁路保证苏

① 计：《照会》二件，《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大连协定之议定书》，《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所签订关于旅顺协定附件》，《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1327-1340页。

② 《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152-153页。

③ 是日上午宋子文、胡世泽等人赴美国。次日，王世杰等回重庆。

④ СКО, ч. 2, 第199页。

⑤ А. М. Ледовский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 (1937-1952), М., 1999, стр. 61.

联拥有一条从莫斯科到远东疆界的捷径。除了铁路，当年同样用俄罗斯的钱建造的几十个大型工业企业和为铁路服务的设施也成了中苏共有的财产。此外，中国政府还同意共同利用当年为日本关东军服务的满洲强大的军工和民用生产设施。这一切不仅极大地加强了苏联在远东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实力，而且从战略上加强了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防御地位。在经济方面，满洲那时具有强大的工业潜力，并拥有丰厚的人力资源。苏中在满洲的合作可以成为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的强大基地和极大的推动力。”

对于新疆问题，条约中载明苏联执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方针。俄罗斯学者认为，第一，中国“不能用政治和强力手段”解决这个多民族居住区的民族问题，第二，国民党应当感谢苏联的立场，“哪怕苏联为支持当地民族自决的想法而对新疆事态稍加干预，那就够中国政府应付的”^①。从这些话里我们自然会产生一种新的感觉：与其以苏联学者长时间坚持的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无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来形容战时的中苏关系，莫如以丘吉尔的话“国家利益是永恒的”予以概括，这样难道不是更加冷静、客观而实际吗。

国民政府从这场博弈中得到了什么呢？第一，苏联参战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灭亡。第二，中国收回了被日本侵占的东北领土，尽管主权并不完整。第三，在对待共产党问题上国民党得到了苏联不援助中共的保证，从而间接排除了苏联支持中共推翻国民政府的“顾虑”。

然而，条约也给中国留下了后遗症。

首先，关于战利品问题。宋子文表明了中方主张“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他也确实据蒋之命“在订约之前”与苏方“切商或

^① CKO, ч. 1, стр. 23 ~ 24.

声明”^①，但条约未对战利品问题做出任何规定，使后来国民政府同苏联就东北问题的交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世界导报》说苏联从我国东北搬走的物资达 80 亿美元^②。

第二，关于“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之财政事项”，蒋介石在 8 月 7 日命令宋子文将战利品和财政等问题“择时讨论”^③，但中苏签约前未及讨论，这一重大争议被搁置起来。后来仅苏联在东北发行的 10 亿军用票一项，国民政府蒙受的损失至少 6~7 亿之多^④。

第三，关于犯罪案件管辖权之划分，条约中仅规定中国之“人民对苏联军队犯罪过之案件”若在军事行动地带内，“应归苏联军总司令管辖”^⑤，而对于苏联军队对中国人民所犯罪过之案件的处理却没有任何规定。乃至对苏军进入东北后犯下的诸如抢劫、侮辱妇女等案件的处理，中方无法可依，只能归“苏军总司令管辖”。

第四，国民党奉行的是同意外蒙独立，以此为让步来换取苏联在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上让步的方针。苏联允诺对中共“并不予以支持，亦并无支持彼等之意图”；对华援助只“给予蒋委员长之政府”；认为“中国必须只有一个政府与一个军队”，“希望共党之军队应并入政府之军队”^⑥，在当时确实让蒋介石和

① 这是蒋介石 8 月 7 日发给宋子文的电报，见《战时外交》（二），第 642 页。

② 孙科：《亲美乎？亲苏乎？》，1947 年 8 月 3 日《中央日报》。这是诸多统计中数字最高的，其他还有《鲍莱调查东北工业报告（1946 年 12 月 15 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 7 编第 1 册，第 263~267、274~275 页；详见王朝光《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中华书局，2000，第 440 页。

③ 《战时外交》（二），第 642 页。

④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侵据东北折冲纪要》，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865 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第 37、39 页。

⑤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 1339 页。

⑥ 《战时外交》（二），第 613~620 页。

国民党领导人“放心”了。事实证明国民党以此为交换条件，可最后的结果事与愿违，“赔了夫人又折兵”。

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国共两党代表由徐永昌率领在密苏里舰上接受了日本的投降，这是国民政府的鼎盛时刻。然而中国毕竟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丧失了外蒙古，剩下的仅仅是外交上的面子：以“外蒙公民投票”决定其是否独立。国民党被迫把旅顺大连的部分“优越权宜”让给苏联，蒋介石“租借地不能再有”的追求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九 胜利果实无法盘点

——蒋经国同苏联的交涉

战后蒋经国同苏联第一次交涉的背景与结果。8年抗战的消耗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然而世界大战硝烟甫散，中国内战烽火再起。

原来就在得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后，中共军队朱德总司令于8月10、11日两天内发布了7道命令，中共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分别率兵向察哈尔、热河、辽宁进发，贺龙、叶剑英部北调。周保中为书记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配合马林诺夫斯基（Р. Я. Малиновский）率领的苏联红军分东西北三路进入东北。^①8月中旬曾克林的部队已经在平泉与苏联红军会师，8月30日中共拿下山海关后扼住了出入东北的咽喉。9月6日曾克林部进入沈阳，组织了新政府，自任卫戍司令，焦若愚任市长。沈阳大批无人看管的武器弹药，苏军未占领的中小城市和农村，都到了中共手中。^②至此，中共掌握了东北丰富的矿产

^① 关于此期间中共同苏联的联系，还有待挖掘档案史料。

^② 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黄友岚主编《争取和平民主》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208-209页。

和人力资源，特别是重要的工业基地和设施。一批苏联专家从1945年起就在这里同中共东北局合作，稳定局面，发展经济。旅顺、大连成为具有“现代炮兵、空军、海军装备的军事基地”，“辽东半岛成了中国人民民主力量展开胜利进军的重要基地”。^① 1945年刘少奇和高岗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这一切赋予该地区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共代表周恩来从9月1日开始与国民党在重庆谈判组建联合政府，此时中共的政权要求已经有了强劲的依靠：内有200万正规军，120万民兵，一亿以上的人口，外有苏联的支持，一个新政权正崛起，国民政府已风雨飘摇。

蒋介石不仅担心东北落入中共手中，而且担心此后难保华北。国民政府设立的，由熊式辉主持的中央设计局在抗战后期建立了一个东北设计委员会，研究接收问题，训练干部，处理对苏联和对中共的关系。熊等还苦心设计，提出了以三民主义为施政方针，逐步实施平均地权，把东北的公私企业收归国有，争取一些中间派参政等民主改革的措施。这样既帮助国民党少受“独裁”的指责，又能以不“赤化”也不反共的“中立色彩换取苏联的支持，以确保国民党对东北的控制”。^② 8月30日国民政府明令接收东北办法。东北计9省，设立行营，在长春设外交部特派员公署。次日国民党六届中常会第九次会议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69次常会通过了《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决定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处理接收事宜。9月1日任命熊式辉为主任，张家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莫德惠为东北宣慰使。

① О. Б. Борисов, В. Т. Колосков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 1980, стр. 28 - 29.

② 《熊式辉日记》，1945年6月5日。引自汪朝光《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第376页。

蒋经国同苏联的交涉出师不利。中国要收回自己的领土，本为“客卿”的苏联，却以“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为由而在10月5日正式通知中国，苏“坚决反对”^①作为主权国的中国登陆。但熊式辉、莫德惠、蒋经国依旧按原计划于12日到长春接收。13日熊式辉在长春会晤俄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交涉未有结果。蒋经国看出：“苏军撤退以前，吾方在政军方面不容有丝毫自由行动。”^②熊式辉等无计可施，只好回到重庆向蒋介石当面请示。

中国方面的被动固然一定程度上受累于条约模糊的条文^③，但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到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不可能阻止苏联和中共的密切协调与行动了。

蒋介石于10月18日同彼得洛夫会晤，重申熊式辉向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提出的“关于请苏联向中国提供运输工具以调兵赴东北的要求”，并“允许中国军队在大连登陆”^④。10月23日彼得洛夫当面拒绝蒋介石，说“该港口纯属商港。不能从违约开始履行条约。”蒋介石强调“这里的土地和港口本身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否则“中国主权就受到侵犯，自然也就违背了中苏条约”。他再次要求“斯大林大元帅……妥善解决中国军队在大连港登陆的要求。”否则中国就“不能派军队到东北来从苏联军队手中接收这片土地”。^⑤然而，国民党不仅未能接收大连，甚至在马林诺夫斯基说出“行营既为收复事而设”，那么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19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22~123页。

③ 条约中规定：有关作战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力与责任“属于苏联军总司令”，“依据苏联军总司令之需要及愿望，特予地方当局指示”，也就是说，中国在这里的一切行政都必须有“苏联军总司令”的首肯；《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队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前引王铁崖，第3册，第1339页。

④ СКО, ч. 2, стр. 275.

⑤ СКО, ч. 2, стр. 280.

蒋经国应该考虑“可否取消”之^①的一番话后无奈地决定把东北行营的400余名人员迁移至山海关，自17日开始至23日用飞机由长春接运军队。熊式辉、蒋经国只好又一次退让。25日马、熊谈妥，中国从葫芦岛登陆。

国民政府的处境可想而知，但关于战利品的交涉以及由此引出的中苏经济合作^②，却使它雪上加霜。虽然1945年8月蒋介石曾就东北战利品处理明确指示宋子文^③，然而1945年10月马林诺夫斯基坚称，日本和伪满洲国经营的、日本与伪满洲国联合经营的所有产业，均当视为苏联的“战利品”^④。熊式辉、张家璈等立即感到事态严重，若照苏方理解办理，中国会“丧失经济独立”，张家璈坚持“满洲所有敌产，应以抵偿所欠人民债务，如有剩余，应以赔偿中国战争损失，故应归中国没收”；东北工矿企业，苏联不得继续拆卸，否则“东北军事政治因时势所迫，处于不利地位。若经济再落空虚，则真名存实亡矣。”^⑤战利品成为国民政府在接收东北遇到的第二个障碍。条约中对于“战利品”没有明确的界定，遂成为国民政府对苏交涉中的又一个难题。中国实际上“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⑥。

苏军经济顾问斯拉德科夫斯基（М.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据苏方对战利品的界定而于11月14日提出苏联拟以它“没收的敌产”作为投资同中国合作。事实上纳入所谓“合作”的企业几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26-127页。

② 详见汪朝光《战后东北经济合作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

③ “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的一部分”。《战时外交》（二），第241页。

④ 这笔财产的数量迄无精确统计，也难有精确数字，见“苏军驻留期内东北工业损失调查报告书（1947年2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263-267、274-275页。孙科说是“80亿美金，超过德境3倍”，见其文《亲美乎？亲苏乎？》，1947年8月3日《中央日报》，第1版。

⑤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371-372页。

⑥ 前引孙科《亲美乎？亲苏乎？》。

乎囊括了东北所有的重要工业企业：本溪、阜新等煤矿，鞍山、本溪钢铁厂，主要的有色金属、本溪的化学工业，沈阳的机器制造业，丰满电厂等^①。不仅中国政府不能接受，连美国也出而反对，因苏联若独霸东北将违反美国“门户开放之原则，明显的歧视美国企望获得参加满洲工业机会之人民……置美国商业利益于显著的不利地位”^②。这样一来，在东北，国民党就处于以它和美国为一方，以中共和苏联为另一方的国际对峙状态中。在莫斯科的英美苏三国会议上（1945年12月）这一角逐激烈表现出来^③。虽然中国问题是中心议题之一，但英美苏都没有想请中国参加，这是大国背着中国举行的另一次会议^④。

蒋经国赴苏交涉。中苏“经济合作”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前景如何，吉凶难卜。蒋介石再次派遣蒋经国等赴苏。1945年12月3日彼得洛夫告诉中国外长王世杰，苏联欢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到莫斯科^⑤。12月24日蒋介石致函苏联，说蒋经国会到莫斯科向斯大林转达一切^⑥，有趣的是，他没有说明蒋经国的使命，而令莫斯科一头雾水。

不过12月29日苏联有关部门确定了接待蒋经国的方针：坚持苏联已有的行动，如从东北拆卸工业设备，拒绝中国方面可能提出的阻止苏联拆运或向苏联索偿的要求。对于中长铁路，国民政府无力保证中长路正常运转，苏联应提出组织本国武装护路队的要求，直到中国据条约建立起护路军为止；一定要阻止美国势

① 张家璈：《东北接收日记》，1945年12月11、13日，前引汪朝光，第433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453-454页。

③ 据雅尔塔协定，美、英、苏三国外长应当每隔三或四个月会商一次。于是有旧金山、波茨坦和伦敦会议。会上争论的情况见 Byrnes, *Speaking Frankly*, N. Y.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47, p. 227。

④ 英美认为“中国不会有怨言。” *FRUS, 1945, Vol. II, p. 831.*

⑤ *CKO, ч. 2, стр. 311.*

⑥ *CKO, ч. 2, стр. 321.*

力向东北渗透，“我们摆脱了邻国日本，不能让满洲在经济和政治上成为另外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苏联要“坚持”已经搁浅的中苏经济合作，与中国合力“开发”日满企业；对于大连，苏联要做好组织工作，使大连（包括现有的大型船舶修理厂）事实上由中苏共同开发；加速以整个满洲为服务对象的中苏联合航空公司的建立；铁路运输税率的制定务必有利于中长路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联结。

有了苏联的充分准备，蒋经国使命成功的几率有多少已经不言自明了。不过苏联做出了相当友好的外交姿态，斯大林决定亲赴机场迎接蒋经国^①。

蒋经国同斯大林等人的第一次会晤。退让、示好已经无济于事。1945年12月30日晚9时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和蒋经国与斯大林会见。

会晤伊始，蒋经国把蒋介石的信面交斯大林，感谢苏联出兵东北加速了日本投降，并说明此次前来，是谈判进一步促进中苏关系，同父亲的“好友”们商谈不必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问题。这指的就是国共关系问题。“蒋介石承认国共两党共存的可能性，国民党无意消灭共产党。”况且“国共的和平共处还能使国民党不致腐败，并迫使该党前进。”不过，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共不得有消灭国民党的打算。”蒋经国说，蒋介石同毛泽东谈判的结果是，中共可以拥有18~20个师的兵力，但不能利用武装分裂国家。他有意探询斯大林的看法而特别指出，中共宣传的是“既然外蒙古已经宣布独立”，那么中共“也要争取内蒙古的独立”。斯大林明确表态：“这是愚蠢的，苏联政府不能对中共的行动负责。”^②

在这种情况下，蒋经国转达父亲的要求，请斯大林“利用

^① СКО, ч. 2, стр. 323 - 325.

^② СКО, ч. 2, стр. 331.

自己的威望”“对共产党施加影响”并出面调停国共关系，斯大林婉言相拒，说自从重庆谈判后，中共知道苏联“不满意”他们的行动，没有再找苏联出主意，未必欢迎苏联去调停。不过如果中共来谈，苏联会提出建议。^①

对于中国的国家统一，斯大林说，他不知道，中共是否要在中国实行苏维埃制度。苏联认为中国不能出现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苏联的立场是明确的：国民党要建立一个吸纳共产党和各方代表参加的政府。在莫斯科三国会议期间已经明确了这个思想。此外双方主要讨论了东北和新疆问题。

关于东北，蒋经国保证东北绝对不会成为反苏基地，中国甚至可以不在中苏边界驻军。中国愿意把中苏边境安排得像美国、加拿大之间那样平和。蒋介石已经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彼得洛夫^②。东北应当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但保持苏联的“优越地位”，中国可以把东北所有财产的一半给苏联，但这不是“战利品”。然而蒋经国的建议没有得到斯大林的认同，后者认为苏联有权从东北拆卸设备，还举了对待波兰的例子，意在证明苏联完全有权处置当年德国在波兰建立的企业和设备。

至于东北的开发，蒋经国说中国想开办的中苏合资企业绝不止一个，机械、冶金等部门都可以考虑合作开发。这样可免去仿效日本株式会社做法的嫌疑。

关于中美苏三国在东北的关系，蒋经国明显地示好苏联，说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苏是邻邦，中国愿意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至于美国，它答应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中国也欢迎。美国当初为帮助中国抗日，派海军7个师来中国，待处理完日本军队后就肯定撤出。斯大林不仅不满意美国对侵华日军的处理，而且说外国军队在中国的存在对国民政府的威信也产生不

① СКО, т. 2, стр. 330.

② СКО, т. 2, стр. 335.

良影响。^①接着，他语出惊人：“苏联政府不想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能让任何一个外国军队到满洲，无论是美国的，还是英国的。”^②

关于新疆，国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本来中国政府军驻守新疆是行使主权，由于新疆的起义分子要求国民党政府军在一个月内撤出新疆，国民政府不得不答应，但要求苏联为此居中斡旋，以达到延长中央军撤离新疆的时限，从而保全国民政府的面子。此外，还讨论了日本战后处理等问题。^③这次谈判主要由蒋经国系统阐述国民政府的立场。双方没有达成重要协议或共识。

父为子遥做配合。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也为两国谈判制造良好的气氛，他于1945年12月30日在公馆宴请马歇尔将军后，又把苏联使馆的Л. М. 米克洛舍夫斯基（Миклошевский）、罗申（Н. Б. Рощин）、费德林（Н. Т. Федоренко）留下，品茗叙谈，并向彼得洛夫送上一个信息：国民党“不想消灭中共军队。中国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有其特殊性，在中国不同政党和派系的武装力量可以和平共处。事实上我们允许素来以革命性著称的广东军队、西北军存在，就可以作为这方面极具说服力的证明”。“不过，各派军队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存在，这就是：‘所有军队不管其归属和派系，都必须严格切实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否则就不能达到国家的联合和统一’”。^④

蒋经国同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谈。1946年1月3日，蒋经国再次同斯大林讨论几天前涉及的问题。斯大林对中国不能把前述东北境内的物资算作苏联的战利品“而感到气愤”。关于国共关

① СКО, ч. 2, стр. 328 - 329.

② СКО, ч. 2, стр. 338.

③ СКО, ч. 2, стр. 339.

④ СКО, ч. 2, стр. 339 - 340.

系，斯大林不明白为什么国共不能达成协议，他认为尽管“毛泽东是一个很各色的人，一个各色的共产党人。他总在农村逛来逛去，躲避大城市，对大城市也不感兴趣”，但苏联还是主张国共和解。也许是为了给国民党释疑，他说共产党的力量并非很大，“毛泽东宣称中共拥有150万军队，美国人说，他只有60万”。^①至于共产党人进入政府事，斯大林举了匈牙利为例，说明中国可以允许反对派进入政府。蒋经国显然感到中共对国民党的威胁，便问斯大林“是否认为国共可以并存”。斯大林认为“如果通过自由选举，国共都能存在下去”。他强硬地表露了对国民党的不满，如该党“支使”一些人在东北散布反苏情绪和传单等。蒋经国再三解释也无济于事。

关于政府结构和组成，蒋经国同斯大林讨论过波兰、法国的政体，儿子显然比父亲更加“开明”，主张启用抗日战争中涌现的新人，改革政府。斯大林予以认同，主张国民政府在干部使用上“优胜劣汰”。^②至于中国是实行一党制还是两院制，中共拥有军队且不听蒋介石指挥等问题，恰恰是斯大林根本不想回答的。

关于中美苏关系，斯大林认为“蒋介石同美国保持友好的政策也是正确的”。

对于中苏经济关系，蒋经国探询到的情况是，苏联可以购买中国的农产品（如大豆、棉花等）和一些矿产如钨，苏联则可以向中国提供机床、机器和专家。蒋经国则表示希望派遣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斯大林表示欢迎。

双方没有签订任何文件。蒋经国的示好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便于5日回国。历史没有再为国民政府提供同苏联合作的机会。

^① CKO, q. 2, стр. 354.

^② 蒋经国说这是一些冒充国民党的人干出的反苏勾当，满洲情况复杂等。CKO, q. 2, стр. 558.

结 语

宋子文、王世杰和蒋经国是国民政府存续期间向苏联派遣的最后两批使者。如果说1932年两国复交，1937年8月中苏条约签订后出现了蜜月，那么1941年3月《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使蜜月中的两国开始貌合神离，但依然维持着外交，“友好”的音符越来越弱。1945年8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未开启两国关系的友好时期，甚至可以说是关系恶化的开始。由于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原因特别是因政权腐败而丧失民心的国民党，在外有苏联援助内有东北根据地和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并具有强大武装力量的中共面前，已经成了破屋漏舟。宋子文、蒋经国、王世杰等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使的。他们的外交没有获得国民党意料中的成果：请苏联切实不要支持中共。宋、蒋、王的博弈没有达到保住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的目的。